

召公奭与西周燕国的建立

王彩梅

一、召公身世

召公奭是西周燕国的奠基人，在北京早期历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然而，关于召公奭的出身历史如何，史籍中记载甚少，今人也论之不多。在《史记·燕召公世家》中，关于他的早期情况有以下记载：

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周武王之灭纣，封召公于北燕。

这项记载不仅简略，而且还遗留下许多问题，以致后人对其中某些内容的解释众说纷纭。例如，文中提到“召公奭与周同姓，姓姬氏”。既然“同姓”，就表明二者有血缘关系，而“血缘关系”也有亲有疏。至于召公奭与周王室的亲疏、远近的实际情况如何，在上述记载中是找不到答案的。而这项内容也正是关系到了解召公奭身世的一个重要问题。后世学者曾提出了种种说法，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认为召公奭是“周之支族”或“周之分子”的说法，如《谷梁传》庄公三十年：“燕，周之分子也。”

范宁注：“燕，周太保召康公之后，成王所封。分子，谓周之别子孙也。”

杨士勋疏：“分者别也。燕与周同姓，故知别子孙也。”

《史记·燕召公世家》引谯周曰：“周之支族。”

不仅这两部书这样说，就是《尚书》伪孔传也同样是这样说，如在《尚书·君奭》中注“君奭”篇名时说：“尊之曰君。奭，名。同姓也。”孔颖达在疏中也是主张这个说法，可见此说的影响是很大的。

在这里有一重要问题：召公奭与文王是

什么关系是不是文王之子。上述记载不是否认就是回避了这个问题或者说得笼统。

后世学者否认召公奭是文王之子者，其重要根据有以下两条资料，《史记·管蔡世家》中，记载了武王同母兄弟十人的名称，其中并未提到召公奭。另外，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中记载了周王朝大夫富辰列举的文王十六子所封之国，其中也未提到召公奭所封之燕国。

参照了这些记载，后世不少学者认为，召公奭并不是文王之子。孔颖达在《尚书·君奭》疏中提出：“僖二十四年《左传》富辰言文王之子一十六国，无名奭者，则召公必非文王之子”。至今仍有不少学者接受这一说法。

然而，这并不是唯一的说法，在古籍中也还有不同的记载，《白虎通》卷三《王者不臣篇》云：“诗云：‘文武受命，召公维翰’召公，文王子也。”

王充《论衡·气寿篇》：“邵公，周公之兄也。”

皇甫谧《帝王世纪》云：“邵公为文王之庶子。”

在这些文献中都明确记载，召公奭是文王之子。现在需要弄清楚的是，在上述两种说法中，应以那一种说法为据。文王的儿子很多，除十子、十六子说外，在《诗经》中也有记载，其数目字就更多了，在《诗·大雅·思齐》中云：“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

大姒为文王之妻，“则百斯男”，这是说

大姒有一百个男孩。一个人生了“百子”，这是不可能的，对此，毛传曾作了这样的注释：“大姒十子，众妾则宜百子也。”这个说法也为孔颖达所接受。他在《思齐》疏中说：“大姒一人有十子，不妬忌而进众妾，则宜有百子，能有多男为国之屏翰，是妇人之美事，故言为大姒之德也。”

这是说，文王之百子并不是一个人所生，而是大姒加上文王之“众妾”共同生了百子。按孔颖达所说，这“百子”都为捍卫周王室贡献了力量。他在《思齐》疏中反复说：“（大姒）思贤不妬，进叙众妾，则能生百数之。此男得为周藩屏之卫也。”是否真的如此，今天不得而知，不过“封建亲戚，以蕃屏周”是周王室的政策。孔颖达所谓“百子”为周室“蕃屏”之说，也是根据这个政策推测出来的，并没有什么事实依据。不过毛传与孔颖达疏对“则百斯男”一句，倒是作出了一个解释，这个解释对后世有很大影响。“文王百子”之说流传得很广泛，直到近代，在人物画中还有“文王百子图”之类的画在流传。这些虽然未必都要归之于毛传孔疏的影响，但分析其思想渊源，恐怕与毛传孔疏之说不能毫无关系。

然而，毛传在这个问题上的解释是很勉强的，“则百斯男”的“百”字，恐怕不是实际数字，不能当作“一百个男孩”解。此“百”字应是形容词，表示有很多的孩子。如果一定要把它当作实词解释，为什么不多不少，正好生了一百个男孩，这就很难不引起人们对这件事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文王之子虽然未必有百人，但也应该是很多的。正因其多，才有这样的诗句来形容他。至于具体的数字是多少，在史籍中并未留下记载。《史记》中所记的武王弟兄十人，《左传》中提到的文王之子十六人，恐怕不能认为这是全部人数，不能排除在这数

字之外尚有“文王之子”的可能性。既然如此就不能据此作出结论，认为《史记》与《左传》未提到召公奭是文王之子，因此他就不可能是文王的儿子。

文王有妻有妾，其所生子女，就有嫡庶之分。武王为大姒所生，所以武王为嫡。《史记·管蔡世家》中所列的文王十个儿子的名单，均为嫡子。司马迁还在文中十分明确地注明，这十个儿子均是“武王同母兄弟”。说明这十兄弟乃是一母所生，均为大姒之子，至于文王其他配偶所生之子，并未在这名单之内，这就留下召公奭为文王庶子的可能性。

王充在《论衡》中说的“邵公，周公之兄也。”《白虎通》说的“召公，文王之子也。”皇甫谧《帝王世纪》说的“邵公为文王之庶子”等等，看来是有此可能的。近代也有人主张这个说法，陈梦家先生在谈到周公、召公对周王室的贡献时说：“当武王受命之初，周召兄弟辅助其兄武王伐殷，左右成王平定四方之乱，是功劳相当的。”^[1]

虽然《史记》中说：“召公奭与周同姓”，但不能据此把“与周同姓”的提法和“文王之子”二者对立起来，“与周同姓”不等于不是“文王之子”。如毕公高为文王之子，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富辰列举文王之子所封十六国中，就有“毕、原……”等国。可见，毕公高为文王之子，而《史记·魏世家》在谈到毕公高身世时也说：“毕公高与周同姓”，可见，“与周同姓”与“文王之子”二者的含义不是互相排斥的。

此外，西周初年武王死后，国内发生武庚之乱，《逸周书·作雒解》在记述当时周公、召公的情况时说：

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

这里把周公、召公并提，文中有“父

兄”二字，此“父兄”是谁的“父兄”？从文意上看应是指周公、召公二人之父兄，亦应包括召公在内，可见召公与周公是兄弟关系。《逸周书·祭公解》中还有以下一段记载：

王曰：“呜呼，公！朕皇祖文王……暨列祖召公”。

此处之“王”是指周穆王^②，距成王时期已有四代了，称召公为祖，当然可以了。这里提到的“列祖召公”可知召公与穆王还是有比较亲密的血统关系。清代学者左暄，很注意这两条记载。他在《三余偶笔》中提到这两条记载时认为：“此召公为文王子之确证”。

从历史的实际情况来看，说召公奭是文王之子，也很合乎他的情况。召公奭在周王室中的地位很显赫，位列三公。《史记·燕召公世家》云：“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史记·周本纪》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可见在史籍中常是周公、召公

并提，在王之左右，成为成王的重要辅佐，参与周王朝的重要决策。

在史籍中还记载召公与周公曾有过以下一件事，《史记·燕召公世家》云：

成王既幼，周公摄政，当国践阼，召公疑之，作《君奭》，《君奭》不说周公。

此事在《尚书·君奭》中有记载。《君奭》篇的序中说：“召公不说，周公作《君奭》”。

此事是说，召公曾疑周公，至于怀疑周公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我们可以不论，这里只是说，召公敢于怀疑周公，除了他的政治地位之外，他与周王室贵族的血缘关系也在起着重要作用。否则是不敢对文王之子，正在执掌大权的周公有任何怀疑的。

综上所述，在谈到召公奭的出身时，若说他是文王之子，据现有资料来分析，其可靠性是比较大的。

二、召的地望

在文献记载中，提到召公奭的名称时，有时也单称召公，或称召伯、召康公、太保奭等，“奭”是其名，这在《尚书·君奭》、《顾命》等篇中均有明确记载。《说文》第四篇上顶部奭字下，在解释“奭”字时亦云：“此燕召公名”。而燕召公之“召”字，则是个地名。《史记·燕召公世家索隐》云：“召者，畿内菜（采）地，奭始食于召，故曰召公。”《史记集解》引谯周曰：“周之支族，食邑于召，谓之召公。”《诗·甘棠》毛传云：“召伯姬姓，名奭，食采于召。”

这些资料说明，召是地名，召公奭因食采于召而称“召公”。可见，“召”地为召公起家的地方，是他最初受封的采邑。但

“召”在何处？其地理位置在史籍中也是可以考见的。

《诗·周南召南谱》：周召者禹贡雍州岐山之阳地名。”

考《禹贡》雍州，在今陕甘一带，岐山在今陕西岐山县北。山之南为阳，所谓“岐山之阳”即岐山之南。可见，这里所说的召之地望，当在今陕西省岐山之南，约当今陕西省岐山县一带。其它文献所记也与此相当。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谈到召穆公时，杜预注云：“召，采地，扶风雍县东南有召亭。”

《水经注》卷十八渭水：“雍水又东迳邵亭南，世谓之树川亭，盖邵、树声相近，误耳。亭，故邵公之采邑也。京相璠曰：亭在周城南五十里。”《括地志》云：“邵亭故

城在岐州岐山县西南十里。”

这里所说的召地的位置，是处于周人先世太王古公亶父所迁居的地区。古公亶父原居于豳，因避戎狄的侵扰，迁居于岐下。此事在史籍中有明确记载，《史记·周本纪》云：“（古公亶父）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诗经》中有的诗篇也描述了这段历史情况，《诗·大雅·绵》：“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诗·鲁颂·閟宫》也提到古公亶父所居之地距岐不远。其诗云：“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

此处之“岐”是指岐山，“岐下”即岐山之下，这一点古有定说。孔颖达在“绵”篇中注“岐下”时说：“岐山之下”。岐下为岐山之下，“岐之阳”当是岐山之南。这与前面提到的“召”之地望是相符合的。

召在岐山之阳，正处于古公亶父所迁居的区域以内，而召作为召公奭的采邑则是较晚时期的事，其具体情况在《史记·燕召公世家》有以下记载：“召者畿内菜（采）地，奭始食于召，故曰召公，或说者以为文王受命，取岐周故墟周、召地分爵二公，故诗有周召二南，皆在岐山之阳，故言南也。”

三、关于周、召分陕而治和召公年寿问题

与召公奭有关的，还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即周公、召公分陕而治。此事也见于古文献记载，《春秋·公羊传》隐公五年：“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史记·燕召公世家》：“其在成王时，召公为三公，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

这个“陕”在何处？据东汉学者何休云：“陕者盖今弘农陕县是也。”^④

对于周召二公分陕之说，古今以来，都有学者对此抱怀疑态度，宋王应麟在《诗地

此事在《诗经》中已有记载，《诗·周南召南谱》云：“文王受命，作邑于丰，乃分岐邦周召之地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于已所职之国。”《诗·大雅·文王有声》云：“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

这里是说，“文王受命，作邑于丰”以后，便以丰为都城，迁都于丰，并将原岐下地区的周召二地分给周公旦、召公奭作为他们的采邑。这个记载告诉我们，召公奭所以被称为“召公”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也就是说是从文王定都于丰以后开始的。

岐下，是指岐山以南的地区，这个地区很广旷。召地在其中的什么位置，近年来经考古发掘，也有了一些具体的了解。

今陕西境内是周人活动的重要地区。多年来，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的西周青铜器以及西周的遗址和墓葬，主要分布在陕西中部的渭水流域，其中周人的早期遗存主要是分布在渭水北岸。分布的最密集之处，则是在今岐山、扶风县境。据考古学家研究，周先人古公亶父所定居的岐邑就在今岐山县境内^⑤。召公奭的采邑“召地”，也应在这个地区。

理考》中说：“朱氏云，公羊分陕之说可疑，盖陕东地广，陕西只是关中雍州之地，恐不应分得如此不均。”这是从地理面积上考察提出的怀疑。这个怀疑是有道理的，清代学者梁玉绳对分陕之说也有同样的怀疑，他作了一番考证，认为分陕之说的“陕”字有误，他在《史记志疑》卷十九中说：“各本《史记》多作‘陕’（原注：从两‘人’，音甲）。或作‘陕’字（原注：此从两‘入’）。《公羊释文》曰‘陕’，一云当作‘郟’，‘王城郟郟’。余谓作‘陕’为允。”

吴氏《别雅》曰《唐扶碑》‘分陕之治’，《隶释》云‘反‘陕’为‘郟’，此用字之异者”。案陕与郟本不相同，隶书夹字多变作‘夹’，而‘夹’字形与‘陕’近，故‘陕’亦变从‘夹’，且又左右互易，则与‘郟郟’字无别矣。然《公羊释文》一作‘郟’，古洽反，是‘分陕’元有两传，或碑本所用正为‘郟郟’之‘郟’，如陆氏后说，则非反‘陕’为‘郟’，而用字不为异矣（原注：《集韵》于‘陕’字注云：地名，周召所分治）。”

按照这里的说法，所谓“分陕而治”，实际上应是分郟而治。此“陕”字即“郟郟”，其地在今河南洛阳，这里正是中原地区，也是周王朝的王城所在地。

将两种说法比较起来，分“陕”之说比分“郟”之说较为合理一些。

关于召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年寿，一直是被人所关注的。商末周初，周室的几个领袖人物，如文王、武王、周公等人的寿命都很长，据东汉王充在《论衡·气寿篇》中说：“文王九十七而薨，武王九十三而崩。周公武王之弟也，兄弟相差不过十年。武王崩，周公居摄七年，复政退老，出入百岁矣。”按照这里所说的文王、武王、周公所活的年岁，都在九十以上。然而在当时，寿命最长的还是召公。召公经历了文、武、成、康四代，他是“四朝元老”。召公是古代著名的长寿者，《孟子·尽心篇》“夭寿不贰”下，赵岐注云：“夭若颜渊，寿若召公”。这是把召公当作长寿的典型，召公究竟活了多少岁？《论衡·气寿篇》云：“召公百有余岁矣……传称，召公百八十。”《风俗通》卷十七《七国篇》载：“召康公寿百九十余乃卒。”

说召公活了一百八、九十年，这有些夸大，然召公寿命很长，这确是事实。召公究

竟活了多大，这可以从周公的年岁中推知大致情况。据《论衡》所记，召公为周公之兄，周公活的年龄就很大，《论衡》引《风俗通》说：“周公年九十九”。又据《史记》记载，周公死于成王在位时期，周公死时召公仍建在，召公既然为周公之兄，此时的年龄当然要超过九十九岁。成王死，康王继位，这时召公仍建在。《尚书·顾命》序云：“成王将崩，命召公、毕公率诸侯相康王，作《顾命》。”此事在《史记·周本记》中还有稍详细的记载，其文云：“成王将崩，惧太子钊之不任，乃命召公、毕公率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诸侯，以太子钊见于先王庙，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为王业之不易，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作《顾命》。太子钊遂立，是为康王。”

可见，召公还是成王的顾命大臣。成王死，康王继位，召公仍为太保，召公死于康王在位时期，据《今本竹书纪年》记载，康王二十四年“召康公薨”。康王在位二十六年（《帝王世纪辑存》），则召公死于康王后期。

据上述内容，可推知以下情况：周公死于成王时期，年已九十九岁，此时召公至少也与周公同岁，据《帝王世纪》载，成王在位十六年，康王在位二十六年，而召公死于康王后期，则召公死时的年龄，当时一百多岁了。正因召公具有这种超乎常人的寿命，所以在古代才被看作是长寿的典型。

召公奭不仅仅是个长寿者，他在周初的政治舞台上还是一个曾经起过重要作用的显要人物。但是，像他这样一个人物，死后葬于何处？在历史上一直是悬案。

近年来，在北京房山区琉璃河西周墓地发掘出一座西周大墓，编号为1193号⁵。墓口南北长7.68米，宽度：南端为5.45米，北端为5.25米，该墓共有四条墓道。墓的形

制特殊，四条墓道分布在西北、东北、西南、东南四个角上。墓内出土的铜器、玉器、骨角器、蚌器、漆器等200余件，其种类有兵器、马器、工具、礼器、漆器、货贝、装饰品等。这座墓已被盗，受到严重破坏。可以想见。当年墓内的随葬品一定是很丰富的。

在出土器物中最引人注意的是两件铜器：即一罍一盃。这两件铜器内壁都刻有内容相同的铭文，其中记载了与召公奭有关的事迹，铭文共43字：“王曰太保：‘佳乃明，乃鬯享于乃辟。余大对乃享，令克侯于匭。旆、羌、马、馭、孚、馭、微、克、寘、匭入土眾厥嗣。’用作宝罍彝。”

铭文开头所说“王曰太保”，此太保当是指燕召公奭。可见这篇铭文与召公奭有密切关系。但铭文的内容，各家解释分歧较大，目前还难以有比较一致的解说。

这个墓不仅出土了重要的铜器铭文，而且其墓葬规模大，更重要的是墓葬的年代约

在成王、康王时期，这与燕召公活动的时间是一致的。因此，有的学者提出这座墓可能就是召公奭的墓葬^⑥。这个分析如果不误，则召公的墓地当在今北京房山区琉璃河境内。然此说目前尚未得到确认，不能作为定论。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召公奭是不是燕国的第一代国君。这个问题也是由1193号大墓引起的。该墓由于时代较早，所出铜器的铭文内容是谈分封燕国第一代燕侯的问题。铭文第一句是“王曰太保”，显然这是对召公奭讲的话，因此有的学者根据铭文内容提出：召公奭可能是燕国的第一代国君^⑦。

当然这也是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意见一旦确立，就推翻了过去认为召公奭未就封而以元子就封为第一代燕侯的旧说。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1193号大墓的墓主人是谁，这一点目前还难以定论，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探讨。

四、召公奭与周初的燕国

西周燕国的建立对燕地来说，确实是个重大的变化，也可以说这是北京地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

西周建立前，“燕山之野”与中原地区比较起来明显地看出这里是个荒凉地区，发展较中原落后，所以在古代人们将燕地视为荒僻之处，直到战国时期社会上仍留有这种看法。在《战国策·燕策一》中燕王对张仪谈话时曾说：“寡人蛮夷僻处，虽大男子，裁如婴儿”。在《史记·刺客列传》记荆轲见秦王时自称“北蕃蛮夷鄙人”这些并不是简单的谦称，他反映当时人们对燕地的看法。但东周时期燕毕竟是战国七雄之一的著名大国，这个变化的关键当然是由于西周燕国的建立。

为什么燕国建立后，北方燕地会发生如此明显的变化？这主要是由于新建立的燕国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燕国是西周王朝“选建明德，以藩屏周”^⑧，经过分封而设在北方的一个诸侯国，它是西周王朝统治区域的一部分。西周初年大分封时，受封的各诸侯国都同时分给各种珍宝彝器，而封赐这些珍宝彝器时都按一定的礼制规定，通过这些规定以区别亲疏远近。《国语·鲁语》记载：“分同姓以珍玉，展亲也；分异姓以远方之职贡，使无忘服也。”《左传》定公四年记载：在分封鲁、卫、唐等国时，都同时分给各种礼器和手工业奴隶，其中以鲁国受到封赐的物品最丰盛，除分得土地、奴隶之外，还分到“祝宗卜使、备物典策、官司彝器”

等。鲁国为周公旦的封国，燕国为召公奭的封国。周召二公在周王朝的政治地位是相当的，成王时，周召二公“相成王为左右”^⑨，可见在当时这二人都有很显赫的地位。据此而言，既然鲁国在受封时受到了丰盛的赏赐，那么燕国在受封时也应是同样受到丰盛的赏赐。这些赏赐是由周人带到燕地来的。而周人带来的赏赐以及先进的生产技术等都成为燕地经济发展的重要的物质条件。

召公奭封于燕后使北方燕地的经济文化有了显著的发展和变化，这不仅从文献资料中可以察考到有关内容，而且在考古学资料中也有明显的证据。从已发掘的考古资料中可以看到，有不少进步的文化现象和手工业技术，在召公奭封燕以前的燕地是从所未有的，只有在召公奭封燕以后的西周初年才开始出现的，这种情况可举以下几例：

文字。根据目前所见到的资料来看，西周以前居住在燕地的民族，还没有使用文字。近年来经考古发掘，在燕地已发现了西周时期的文字，计有甲骨文和金文。虽然发现的甲骨文字的数量还不算多，但它不是商代的文字，而是西周时期的文字。金文数量较多，有的铭文篇幅也较长。近年在房山区琉璃河商周遗址1193号大墓中出土的铜罍、铜盃上的铭文竟长达43字，与在中原、陕西等地出土的金文无异，可见其文字使用不仅先进而且也很广泛了。似这样先进的文字当然不可能是在当地突然出现的，毫无疑问它是召公奭封燕以后由周人带到燕地来的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

漆器。今北京地区旧属燕地，在这里至今并未发现西周以前的漆器，在今北京以东地区发现的也不多。今辽宁省敖汉旗大甸子于1977年在一处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墓葬中曾发现两件近似觚形的漆器，由于北方地区发现的漆器不多，所以大甸子发现的两件漆器

是否由当地所产，曾有人提出过怀疑，有的学者说：“远处在北方的这样早的墓葬竟能埋藏着漆器，很可能来自中原或南方。”^⑩当然无论其是否从中原或南方传来，但这些情况反映出当时燕地的漆器是很少见的。

西周燕国建立后在燕地不仅确实发现了漆器而且数量还不少。例如，在1981年至1983年发掘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时，已发现的漆器种类就有豆、觚、罍、壶、杯、盘、俎、彝等器物^⑪。这些漆器均为木胎，有的还镶有金箔和绿松石。有的觚在器身上不仅镶了三道金箔而且还镶嵌有绿松石。更有的罍通体花纹均由蚌片镶嵌和彩绘组成。可见当时漆器的制作水平已是相当高了。这种漆器制作技术应是燕国建立后从西周王朝统治区域的中原地区传来的。

马车，燕山南北地区是北方游牧民族经常出没的地区，西周以前这里尚无马车，西周燕国建立后，马车开始传入。在考古发掘中多次发现西周时期的车马坑，仅1981—1983年的三年时间里，就在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清理出车马坑21座^⑫，虽然车的木质均已腐朽，但仍能清晰地看出车的形制与中原地区的形制是相同的，可见这些马车的制作技术也是由中原传入的。这说明西周燕国建立后，燕地的经济文化有了新的发展。

周初燕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与召公奭有密切的关系。这不仅是因为燕国是召公的封地，主要还因为召公对燕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在《史记·燕召公世家》中记载这样一个情况：春秋初年，山戎侵燕，齐桓公北伐山戎救燕，燕国得以稳定下来，文中记此事之后说：“使燕复修召公之法”。此“召公”应指召公奭而言。这个“召公之法”是什么内容，现在不得而知，但这可说明召公奭对燕国的发展是有深刻影响的。

召公奭对燕国有重要影响，从出土的考古资料中也可以得到反映。在琉璃河黄土坡村出土的董鼎中有以下一段铭文：

匿侯令董饌太保于宗周，庚申，太保赏董贝，用作太子癸宝罇餼粥。

这里的“太保”就是指召公奭，文中明确记有匿侯派“董”到宗周去见太保，太保赏赐了董贝的情况。匿侯所以派董去见太保，自然有其必要性，但由此也可看出太保所发挥的作用对燕国具有重要意义。

另外，传世的小臣盨鼎也有以下铭文：

召公口盨，休于小臣盨贝五朋……。

文中第三字是个关键字，但因构形复杂不识。陈梦家在《西周铜器断代》一文中说：“第三字构形复杂，不能识，但它介于

两名词之间，必须是表示行动作为的动词。”^⑬无论这个字作何解释，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段记载证明召公奭与燕是有着密切联系的。

对于召公奭的历史功绩，司马迁在《史记·燕召公世家》的最后写道：

召公奭可谓仁矣！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燕〔外〕迫蛮貉，内措齐晋，崎岖强国之间，最为弱小，几灭者数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岁，于姬姓独后亡，岂非召公之烈邪！

在司马迁看来，燕国的发展是与召公奭有密切关系的，但他把燕国的一切成就都归之于召公一人，这就有点推崇过高了。

注 释

①于省吾：《尚书新证》。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二）》，载《考古学报》第十册。

②朱右曾：《逸周书校释》

③陈全方：《早期都城岐邑初探》，载《文物》1979年10期。

④何休：《春秋·公羊传》隐公五年注。

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考古队：《北京琉璃河1193号大墓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1期。

⑥⑦殷玮璋：《新出土的太保铜器及其相关问题》，《考古》1990年1期。

⑧《左传》定公四年。

⑨《尚书·君奭》。

⑩王世襄：《中国古代漆工杂述》，《文物》1979年3期。

⑪、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琉璃河考古队：《1981—1983年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5期。

⑬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考古学报》第十册。